

學術論文

當我們談論新冠疫情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麼？*

生命政治，大流行病以及全球失序的一種社會學解釋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Covid-19 ?

Biopolitics, the Current Pandemic and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Global Disorder

柳昕 *Xin Liu (Calvin)*

利物浦約翰摩爾大學國際關係理論與亞洲研究高級講師
Senior lectur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sian Studies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新冠病毒疫情讓世界深陷危機，而此番全球失序的終點至今未見。人們談論新冠大流行時會不斷提到「生命」的概念，然而如果無法理解「生

* 本文的寫作過程得到了中興大學崔進揆博士的幫助與激勵以及對我頑劣拖延癥的無限寬容，在此深表感激。文中一切謬誤均為作者本人所致。

命」的社會學意涵，僅僅考慮致死率遠遠不能解釋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政治後果。藉由阿甘本和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本文認為新冠疫情被絕大多數國家政府塑造成為了迫切需要國家干預的安全議題。通過對安全概念的譜係學考察，本文表明當下對新冠疫情的全球想象已經背離了「生命」的起點，而從根本上成為了一場基於制度拜物教與身份政治思維方式的中國與西方的地緣文化競爭。

Covid-19 has plunged the world in deep crisis and the end of the current global disorder is unforeseeable. 'Life' is the most common utterance 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 pandemic, whereas any explanation of its global-political effects by referring to deaths will be misleading if no proper conception of 'life' is postulated. Drawing upon the concept of biopolitics of Giorgio Agamben and Michel Foucault, this article will argue that Covid-19 has been framed by most state-governments as a pressing security issue that demands exceptional official measures. In mapping the genealogy of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tself, I will show that the current global imagination of Covid-19 has already deviated from the original concern about life. It is fundamentally a geo-cultural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s a cumulation of institutional fetish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after the Cold War.

關鍵字：新冠疫情、生命政治、赤裸生命、例外國家、全球失序

Keywords: Covid-19, Biopolitics, Bare Life, State of Exception, Global Disorder

壹、前言

兩年前當中美貿易衝突開始醞釀，英國深陷脫歐僵局以及台海關係日漸緊張之際，有人曾經說過：2018年或許是過去十年最壞的一年，但卻是今後十年最好的一年。站在2020年的亂局中回看此話，的確是一語成讖。新冠病毒疫情的離奇情節加速了戰後國際秩序的重構以及美國和西方霸權的瓦解；而中美關係降至過去四十年的冰點也加劇了人們對大規模國際衝突的焦慮。如果我們試圖釐清冷戰之後三十年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譜係，會發現一個穩定的中美關係與開放的全球經貿體制一定程度上相互促進甚至互為基礎。當川普（Donald Trump）的貿易戰以及對華經濟制裁已經完全凌駕於一般的經濟理性之上，這或許意味著國際政治中新一輪的範式轉型——我們所熟悉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全球化的實踐和話語都將面臨著來自未知領域的挑戰。許多觀察者已經做出結論：全球化的進程或許將要退回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有限的、局部的全球化。而西方各國政府所宣示的產業鏈本土化、製造業回流動向或許也在重新召喚一種國家本位的經濟安全觀念。

本文不準備去設想國際秩序可能的前景。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美國所倡導的與中國脫鉤¹，還是英國所鼓吹的保護本國製造業計劃²，在手忙腳亂中做出的政治宣示有多少可信度本身就相當值得懷疑。我們要探討的是上述「去全球化」政治或言論動向的內在機理以及當下全球秩序瀕臨失控的社會學譜係。新冠疫情為什麼能在一夜之間讓「所有的確信歸於虛無（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the air）」？這一場大流行病既不是人類歷史上規

¹ 中美經貿脫鉤的討論可見 “The decoupling of the US and China has only just begun”,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9000d2b0-460f-4380-b5de-cd7fdb9416c8>.

² 英國政府與工會在本國疫情爆發之際就討論過製造業回流的 Defence Programme，詳見 Harry Lye, “Unions urge UK Government to fast-track defence programmes”, *Army Technology*, <https://www.army-technology.com/features/unions-urge-uk-government-to-fast-track-defence-programmes/>.

模最大的傳染病，致命性也遠遠不及二十世紀的西班牙大流感、亞洲大流感以及本世紀的非典（SARS）和中東呼吸道疾病（MERS）；然而翻遍史書也找不到諸如 1976 年豬流感如何改變世界的記述，而當下的絕大多數人卻都在談論「永遠回不到過去」的悲觀論調。新冠疫情改變世界秩序以致令全球政治經濟陷入混沌的動能究竟從何而來，個中機理似乎暗合了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Ulrich Beck）所描述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的某些特性——在一個技術催化的生產力「指數增長」（exponential grow）的現代性條件下，風險的分佈呈現了前所未聞的態勢³。貝克提供的是一個季登斯式的，相對簡單的「反思性現代性」模型，即認為傳統工業社會面臨的物質匱乏、分配不均等問題已不是當前現代性的主要困境，更大的威脅來源於技術和全球化帶來的無所不在的「全球風險」。發現和預防這些風險令一個後工業社會的民眾在無法拒絕技術進步的條件下不得不「時刻保持警覺」⁴。與工業社會的風險都是「個人風險」不同，後工業社會的風險與新冠病毒一樣，是彌散性和指數增長的體系化危機。無所不在的風險讓人類文明第一次處在了「火山口」上。

貝克的思路符合當下絕大多數技術官僚的思維，包括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在內的大量公衛專家都認為新冠病毒之所以危險來源於技術讓人類連接得更加緊密，故新冠疫情比西班牙大流感「更是個問題」⁵。然而貝克對傳統風險和後工業時代風險的簡單兩分，似乎簡化了新冠疫情背後複雜的社會文化機理。首先物質分配不均的問題在後工業社會並沒有絲毫緩解，再者即便新冠疫情本身具有彌散性和指數增長

³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⁴ 同上。

⁵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新冠疫情讓這個世界「再也回不到過去」的演說，詳見“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 - 21 August 2020”，*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21-august-2020>.

性，一個「技術催化的風險」也無法解釋新冠肺炎為何逾越了氣候變化、核安全等一系列非傳統安全議題突然佔據了全球政治的舞台中心。世界為什麼偏要在這個當下圍繞著新冠疫情轉？這顯然不單只是疫情本身如何危險的問題。值得議題的是，英國最傑出的大法官和歷史學家喬納森·桑遜勳爵（Lord Jonathan Sumption）在英國宣佈封城之際提出：新冠疫情的防疫政策是空前絕後的對個人自由的侵害，馬上便有公共知識分子指責他忽略了政府在保證民眾基本生命權方面的道義責任⁶。這自然是一種被大眾輿論普遍接受的邏輯：防疫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關乎生命；然而這種邏輯的殘酷之處卻鮮為人知：為了保護生命，我們不惜付出一切代價，哪怕是生命的代價——須知當歐洲疫情死亡率大幅下降之際，各國依舊沒有半點防疫降溫的意思。這種種異常都似乎在向人們低語：新冠疫情並不只是個公共衛生問題，它背後更是個關於「生命」的觀念問題。

因此，圍繞著「生命政治」（biopolitics）這一核心概念，本文試圖探討新冠疫情成為全球安全以及地緣政治議題的社會學譜係（genealogy）。我認為新冠病毒產生的心理聚焦效應以及造成的全球性失序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新冠病毒的傳染性以及所謂的「百年未遇之大危機」。新冠病毒議題的張力和有效性來源於兩個層面上的歷史積累和結構性變動：首先是，後冷戰時期「安全」話語的演變對生命政治的塑造，全球主要國家，特別是西方社會對安全威脅的焦慮由對「防患具體的傷害」轉變成了「對抗不可控性」——新冠病毒的不可控性而非實際傷害使之成為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安全焦慮。其次，這種不可控性的認知不僅源於病毒本身的特質，也源於中國崛起產生的東西方力量對比，生活方式與觀念摩擦的結構性變動。中國與西方的社會觀念差異導致的身份政治是產生新冠病毒「真相機制」（Regime of Truth）的社會學起源，這一套「真相機制」強化了新冠病

⁶ 例如泰晤士報評論員文章表示「新冠自由主義是我們共同的危險」，David Aaronovitch, "Covid Libertarians Are a Danger to Us All", *The Times*, 22 September 2020,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covid-libertarians-are-a-danger-to-us-all-f6s3s0vd8>.

毒作為地緣政治威脅以及不可控安全問題的基礎。藉由佈羅代爾(Fernando Braudel)史學的長週期理論，我將提出分析一系列「安全」話語結構的歷史社會學框架；也將同時分析新冠疫情話語的譜係以期為進一步研究當下全球失序狀態提供指引。

貳、生命政治：赤裸生命和受困狀態

無論東西方，涉及新冠病毒議題的最核心話語都是「生命」(life)。當疫情最初在中國武漢被發現之際，西方社會普遍對中國的指責便是中國政府為了經濟利益掩蓋疫情真相，不顧人民生命。《華爾街日報》於二月初發表的那篇為中國民眾所深惡痛絕的評論《中國是真正的東亞病夫》便把中國疫情的問題歸因為武漢當局的經濟考量⁷。不僅如此，西方媒體以及中國國內公共知識分子所熱衷挖掘的題材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掩蓋真相草菅人命⁸。進入三月，當新冠疫情劇情離奇反轉，中國基本控制疫情，而病毒以更加前所未有的規模傳遍歐美各國之際，中國官方與民間開始攜抗疫勝利的高昂情緒對西方展開了「戰狼外交」，而中國此番對西方攻擊的關鍵詞依舊是「生命」。很快中國的民間自媒體便開始指責西方社會草菅人命放棄救治老人。當英國首相莊漢生(Boris Johnson)三月份宣佈實行「群體免疫」之際，中國社會瀰漫著一股「撿到槍」的勝利情緒；隨後英國首相自己感染病毒，更被罵做「群體免疫身先士卒」。更為滑稽和弔詭的是，當美國疫情走向完全失控，中美雙方逐漸交惡開始互相攻擊時，他們攻擊對方的口實居然一模一樣：抗疫失敗，草菅人命。在這場幼稚的口水仗裡，無

⁷ 詳見 Walter Russell Mead,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3 February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

⁸ 例如所謂一名武漢女子控告中國政府掩蓋真相導致她失去父親的報道。詳見 Tom Cheshire, "Coronavirus: This Wuhan woman is suing China - and wants an apology after her father died of COVID-19", *Sky News*, <https://news.sky.com/story/coronavirus-this-wuhan-woman-is-suing-china-and-wants-an-apology-after-her-father-died-of-covid-19-12058695>.

論你站在哪一方攻擊對手「草菅人命」都不會產生太有智識營養的觀點，然而當衝突雙方互相指摘對方「漠視生命」時，我們有必要釐清生命這一話語的內在結構以及社會學意義。福科(Michel Foucault)告訴我們，「生命」一詞並不只是一個客觀描述，他是一種話語和社會權力結構的象徵。美國學者巴奈特(Michael Barnett)曾經定義說：話語作為一種權力本身是彌散性的。他通過界定知識邊界，規定意義來不斷衍生新的權力主體。「話語生產了有社會意義的主體並通過複雜多變的社會實踐賦予了社會存在以主體性。」⁹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便是「人權」這一話語。語詞本身的普世屬性經由漫長的西方觀念擴散的實踐在全球塑造了一系列特定的人權問題的受難者，他們被賦予了強大的社會主體性——例如「二二八受難者」比日據時代受難者更是人權受難者。

那麼，什麼是生命？對生命以及生命政治理解最為透徹的當代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名著《神聖之人：主權與赤裸生命》¹⁰一書中一言以蔽之：生命不等於簡單的活著。阿甘本在本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古希臘的傳統中並沒有單一的「生命」的語彙。生命一詞的詞源和社會政治含義充滿了內在張力，存在著至少兩種截然對立的表達方式。一是單純表示「活著」的「赤裸生命」zoe，另一個則是表達必要的社會與群居生活方式的 bios。與純粹活著的赤裸生命 zoe 不同，人的政治生活是古希臘人眼中生命活力與意義的源泉。無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他們都極少用 zoe 赤裸生命來指代當代的「life」。對於柏拉圖而言，生物體本身的狀態與存續，對於討論生命的意義基本沒有直接關係。在著名的《斐勒布篇》(Philebus)中，柏拉圖記錄了蘇格拉底對智慧人生的定義：無論是生物體內過於協調帶來的快樂，還是過於紊亂帶來的痛苦，都不是

⁹ 詳見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2015), p. 56.

¹⁰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文世界將此書譯成了簡體中文版《神聖人：最高權力與赤裸生命》，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6 年出版。

智慧的本意；智慧的人格需要在快樂和痛苦之間找到均衡點。相較於沒有限制的快樂，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尺度，因而是最與「善」相關，並可以引導出善的知識的秉性¹¹。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Nichomachean Ethics*）中進一步指出，人的政治生活超越簡單的生活的快樂。無論古希臘人有沒有生理醫學知識，所謂「生物體協調與紊亂」的知識不符合現代科學，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人的生物存在構不成有意義的「生命」概念，在古希臘城邦中討論公民的「赤裸生命」沒有任何意義¹²。

那麼，赤裸生命，即生命的簡單生物存續問題是如何藉由現代醫學成為了當下的國家理由？阿甘本在《神聖之人》一書中有著極其複雜精巧的論述。藉由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阿甘本強調了「赤裸生命」進入了國家權力的機制與算法，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性」問題（*modernity*）。在名著《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福柯即為不近情面地提出，現代性狀態下對人格的剝奪，以及隨之產生的各種複雜政治手段等一套複雜的政治馴化術（*governmentality*）從根本上允許了現代國家即「保護生命」又發動大屠殺。葡萄牙作家何塞·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的經典小說《失明症漫記》（*Blindness*）中，國家為了防止奇怪的失明症擴散而把病人集體囚禁，繼而又開槍對他們進行掃射，似乎暗合了福柯對於「赤裸生命」觀念下國家的父權主義與劊子手雙重人格的描繪¹³。與福柯把這種政治馴化術試做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石不同，對於阿甘本而言，現代國家可以「保護生命」又發動屠殺，根本性質在於西方自由民主政體「例外國家」這一隱藏屬性（*state of exception*）。

所謂例外國家不僅是一個政治概念，也是一個法權概念，阿甘本在他的另一部名著《例外國家》中追溯了例外國家的歷史，它發源於法國大革

¹¹ 詳見《至善與快樂：柏拉圖斐勒布義疏》，Marsilius Ficinus 著，趙精兵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年。

¹²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¹³ José Saramago, *Blindness* (London: Vintage Classics, 2013).

命，歷經整個 20 世紀的流變成為了現代國家的一種範式。與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主權概念相似¹⁴，阿甘本把「例外國家」定義為一種「法外權力」（*extrajudicial*）的載體。值得一提的是，阿甘本並不認為例外國家是現代民主國家的一種變態，而是現代國家演變的一種結構性模式。阿甘本認為整個西方現代國家建構的歷程，便是不斷將「例外權力」從日常法律中抽離出來積累成例外的主權的歷史過程。法國大革命所催生的一切現代民主國家，無論看上去多麼寬容與克制，其內在都不免有一種自覺區分「和平狀態」（*state of peace*）和「受困狀態」（*state of siege*）的機制。國家的常規民事權利與國內警察權可以隨時被收束到軍事權力之下，只要人們認定並接受「受困狀態」¹⁵。新冠病毒傳播伊始，中國政府習慣性地在最短的時間內動員起了軍隊。而在過去三四十年間都沒有動用過軍隊的英國政府，在抗疫成果不彰的壓力下，反覆強調將會動用軍隊發起流行病學調查和配送疫苗。軍隊的介入似乎是對「受困狀態」焦慮的唯一紓解方式。

問題依舊在於，為什麼新冠病毒疫情會讓各國進入「受困狀態」？對於阿甘本而言，這不僅僅是現代例外國家所要週期性操練的政治規範，更應該從「生命政治」本身尋找答案，也就是那個在福柯與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眼裡同樣危機重重的、「把生命化約為簡單的生物存續」的現代性困境。值得一提的是，當三月份疫情剛剛在意大利蔓延之際，阿甘本便不無尖刻地指出，新冠疫情是一個「被虛構的大流行病」(*L'invenzione di un'epidemia*)¹⁶。阿甘本質問：如果在三月份的意大利，只

¹⁴ Carl Schmitt and Leo Strauss,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¹⁵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相似的論述可見於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¹⁶ 詳見阿甘本此文的意大利語版本 Giorgio Agamben, "L'invenzione di un'epidemia", *Quodlibet*, accessed 7 October, 2020, <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l-invenzione-di-un-epidemia>.

有 4% 的新冠患者進入重症監護，意大利政府和媒體為何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這個疫情之上？延續了「例外國家」的思路，阿甘本指出，虛構這個大流行病是一個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題中之意，無非為了達到兩個目的：一是通過大流行病和公共健康安全的話語，無限度地擴張國家的立法權力，哪怕只有一個人感染，只要原因不明，便可以成片地限制一個城市甚至大區的人民自由進出；二是通過大流行病，意大利政府建構了一個「恐懼國家」(state of fear)。通過塑造無邊際的集體恐懼，政府可以隨意干預社會、剝奪人民自由以回應自己塑造的恐懼。隨著疫情的發展，阿甘本所依循的新冠數據自然不再有效，不只是意大利，幾乎所有西方主要大國的感染人數都是天文數字，公共衛生資源的擠兌也自然不是一個「被虛構」的現實。然而阿甘本所提出的問題依舊具有理性穿透力：無論是西方國家最早把武漢形容成人間地獄，亦或是英國政府在病例只有幾百例之際便宣佈有可能派遣軍隊介入維持社會秩序、暫停英國公共衛生署 (NHS) 的常規服務，都清楚地表明了新冠疫情的不確定性與例外國家之間的因果聯繫：哪怕只有一例來源不明的感染者，都可以宣佈國家進入「受困狀態」，通過一切可以想象的臨時立法並暫停正常生活。我們有必要依循「生命政治」的軌跡，追溯「不確定性」是如何塑造國家的「受困狀態」的。

參、作為生命政治的安全議題

國家把赤裸生命從人的政治人格與公民屬性中剝離出來，宣佈進入「受困狀態」而成為例外國家，幾乎是東西方各國在本次疫情之間無一例外經歷過的政治演進形態。無論是中國決定武漢封城，直至武漢病例清零，抑或是美國從一月底開始宣佈臨時禁止中國公民入境，而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幾乎在同時宣佈針對新冠疫情進入「緊急狀態」，這些東西方的「緊急」、「人民戰爭」、「武漢戰役」的話語無不反應了新冠疫情對各式國家治理體制的擠壓與扭曲。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方面直至新冠疫情在國際輿論

上大規模發酵之前都沒有把新冠病毒傳播提上議事日程。而整個二月，無論整個西方國家起初如何在航運客運上封堵中國，也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認真思考過防疫的問題。無論是美國總統川普無休止地宣告新冠病毒會神奇消失，抑或是英國衛生大臣夏國賢（Matt Hancock）無數次重申英國政府做好了萬全的準備，可以確信的是，幾乎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做好了所謂的準備——無論他們以及他們的國內媒體對中國政府的批判如何變本加厲¹⁷。

時至今日，當中國國內瀰漫著強烈的勝利主義情緒，中國政府的「戰狼外交」在一段時間內對西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展開了尖銳批評，中國朝野也相信了新冠病毒防治體現了中國的制度優勢¹⁸，幾乎沒有人會再相信主流西方國家當初「做好了準備」。從美國的川普到英國的莊漢生，從法國的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到公認的歐洲最具威望的政治家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幾乎無一例外應對新冠疫情表現失常，連東方的政治人物沈富雄都在臉書上公開表示：西方國家抗疫的災難說明他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些「抗疫失敗」的西方國家的政黨光譜以及國家能力千差萬別，他們共同的失敗故事似乎說明了西方疫情的失控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施政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更加深刻的集體認知問題。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曾經說過：人類的危機從來都是一場認知危機：關於我們能力邊界的認知危機¹⁹。在經歷了混亂的第一波疫情之後，中

¹⁷ 夏國賢在武漢疫情爆發之初在英國國會的陳述能夠很好地表明這一點。一方面他強調了對湖北及涉華旅行的警覺，另一方面他全然不覺得疫情與英國公眾有關。

Matt Hancock, "Wuhan coronavirus: Health Secretary's statement to Parliament",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wuhan-coronavirus-health-secretarys-statement-to-parliament>.

¹⁸ 中國官方對於「制度優勢」的論述比比皆是，例如中央黨史與文獻研究院院長曲青山的文章《人民要論：我國制度優勢在抗擊疫情中的力量彰顯》：<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617/c40531-31749226.html>。

¹⁹ 詳見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Coleridge to Orwell*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2015).

國朝野瀰漫著自己無所不能的樂觀情緒，而歐美大國在試過了多種防疫手段之後依舊迎來了更慘烈的第二波疫情，似乎也說明西方人依舊不能明白自己的能力邊界和應該設定的目標。這種西方認知的困境一個重要的參照係便是抗疫效果明顯理想的新加坡。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領導人從來沒有表達過要不惜一切代價戰勝新冠病毒；相反，自二月份起，李顯龍總理便不斷地強調目標設定的理性以及手段的比例原則。作為一個技術專家治國的國家，新加坡毫無疑問沒有西方所背負的政治包袱；而這個政治包袱是什麼，是我們理解西方社會在新冠大流行中具體處境的關鍵。

讓我們回到「生命政治」的概念。阿甘本在福柯與阿崙特的理論基礎上指出，國家受困狀態的形成，本質上來源於赤裸生命在現代性的狀態下從公民身份以及人的社會屬性中剝離出來，成為了自由民主政體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在此需進一步探究的是，赤裸生命並非時時刻刻都收到威脅，基於保護赤裸生命生命政治生發出的國家合法性如果沒有長期積累的過程（*increment*）和突發事件（*conjuncture*）的刺激，很容易在日常生活的常態之中磨損。新冠病毒疫情突變成危及赤裸生命的安全事件，是一個中長期社會進程共同積累的結果。在此我們必須釐清新冠疫情作為安全議題的長週期邏輯以及中期邏輯，佈羅代爾史學以及福柯的譜係學概念對釐清這一問題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

理解世界政治中的結構性變革，「時間」是一個重大的解釋範疇。世界史的時間具有社會性，這似乎是佈羅代爾年鑒學派史學家對廣義社會科學的最傑出貢獻。佈羅代爾在最具影響力的三卷本《文明與資本主義》中就指出，日常生活的積累對歷史長週期內的結構性變動具有基礎性作用²⁰。這和佈羅代爾早起所強調的世界史時間的多重性（*Multiplicity*）一脈相

²⁰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I: 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and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04.

承²¹。美國學者約翰·魯傑進一步總結指出：時間作為一種社會學的解釋範疇，其屬性具有社會學意義。構成世界史中史詩性變革的時間大體分為兩類：一種是日常生活中的積累性時間，一種則是突發事件導致的中觀時間²²。突發事件導致的中期變化較為容易理解：例如 911 恐怖襲擊這樣的小概率大轟動的事件。而所謂的積累性時間，即是人們習以為常的長時段物質與觀念變動，這種時間漫長、乏味、不容易為人所察覺，然而卻從根本上奠定了我們所熟悉的概念與範疇：例如佈羅代爾所記錄的飲食、服飾與時尚的漫長演進對地中海資本主義文明的決定性影響。值得一體的是，日常生活雖然乏味，卻並非風平浪靜波瀾不驚。法國哲學家亨利·勒弗在名著《日常生活批判》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日常生活「普世化」的傾向。人們不會僅僅經歷日常生活，人們的日常體驗往往是造神運動的素材。造神運動（*mystification*）在人類通過繁複的日常生活實踐所創造出的各色狹小空間中反覆進行，這些造神運動與狹小空間在個體層面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個人神話，在社會層面塑造了林林種種的絕對觀念。記錄現代經驗的偉大作家，諸如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皆為解釋這些絕對觀念的荒誕、矛盾、無理反智而來。因此，一種馬克思主義觀念下的批判理論，需要從反思日常生活開始²³。

長週期以及日常生活的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時興的安全問題的來源以及其獨特的話語結構。中國大陸學者與國際評論家金燦榮把新冠疫情定義為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非傳統安全戰爭」²⁴，而「安全」的概念

²¹ Fernand Braude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 Dur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3, No. 6, 1 February 1960, pp. 3-13.

²² John Gerard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s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57.

²³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Vol. 2 (London: Verso, 1991).

²⁴ 詳見金燦榮，〈新冠疫情是第一次非傳統安全世界大戰〉，《觀察者網》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84474>。

不僅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早已成為學科範式，也已經深刻地塑造了各國公共政策的思維方式與行為偏好。安全的定義非常容易理解，所謂的確保自身免受傷害的能力即是安全。無論中英文，安全話語本身具有預防性（pre-emptive）的隱喻。傷害沒有發生不表明沒有威脅，而圍繞安全制定政策，題中之意就是要預先行動以避免傷害的發生。然而傷害如果遲遲沒有發生如何才算避免了？這就要求安全政策的主體謀求一種「萬全之態」。舉個簡單的例子，2017年英國倫敦 Grenfell Tower 發生火災，燒死70餘人，這本身是一個極其有限的傷害事件。然而這件事情本身卻引發了無數安全主體對「萬全之態」的主觀感受。英國政府下令在沒有資金保障的情況下大規模改造英國建築的外牆，以期完全杜絕此類高層建築的火警隱患，這一安全導向的政策導致英國近70萬高層住戶瀕臨破產²⁵。足以見得，安全問題的塑造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和放大新冠患者忽視癌症患者的生命政治類似，安全議題本身存在著對不同問題的政治性的、非理性的取捨——安全議題本質上也是一種生命政治。

安全議題的社會建構過程，英國學者巴里·布贊（Barry Buzan）等人做過非常詳盡的論述。簡單來說，構造一個安全問題需要一個「安全化」（securitisation）的過程，即是透過社會建構與公共論述，把一個事件塑造成貌似存在的安全威脅的社會實踐。構造一個安全話語除了要有安全問題的敘述者，一個被社會所接受的講故事的人，還必須有一個相關的「受威脅」對象和樂意聆聽此類故事的受眾²⁶。作為一個經常使用美國社會科學語言的英國學者，巴里·布贊非常喜歡劃分分析單元。他多次指出，「安全化」概念下的安全問題敘述者以及聽眾的意義，在於突破傳統安全研究

²⁵ 英國高層建築的外牆防火危機連帶導致的社會悲劇，詳見 Emma Lunn, “Cladding victims renew calls for government solution”, *Mortgage Solutions*, <https://www.mortgagesolutions.co.uk/news/2020/09/28/cladding-victims-renew-calls-for-government-solution/>.

²⁶ 詳見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21.

的國家中心弊病，而將個體層次的安全威脅也納入到了安全研究的議題²⁷。國家中心主義自然是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理論的通病，而安全主體的多元化，也一度被視作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理論走向更為人性化的「理論解放」（emancipation）的重要變革。肯·布斯（Ken Booth）指出，傳統的基於軍事與領土的安全議題最大的弊病便是其鞏固了以國家為中心的權力結構，以消除安全威脅的名義進行軍事動員，實際上簡化並扼殺了個體的多元需求。因此：「安全關乎消除威脅，解放關乎自由」²⁸。放在今日來看，布斯的「理論解放」議程無疑被當下的安全議題所擱置了——形形色色的防疫政策不僅沒有保護更多的生命，還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個人自由並否定了多元需求。在安全研究把政治主體從國家還原到個人之際，究竟發生了什麼讓「例外國家」愈演愈烈，以至於所謂的新安全主體的「個人」，變成了比民族國家公民更為沒有獨立意志的工具客體。

假設很明確：形形色色的安全研究並沒有把「國家」還原為具有真實情感和獨立意志的個人，他們把個人還原成為了各類同樣中心化的次國家組織單元，與此同時，把個人化約成為了沒有主體性的「赤裸生命」。這一變動背後的長週期邏輯隱藏在冷戰後世界政治的兩大趨勢之中：一是不斷興起的「身份政治」，二是在主要中產社會所瀰漫的工具理性的拜物教文化。身份政治在世界政治中的蔓延由來已久，冷戰兩極格局的核恐怖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林林總總的身份議題²⁹。冷戰後安全議題的多元化提供了關於身份政治的正當性論述。與傳統的領土安全問題不同，身份政治問題無法設定理性與有限的目標，其內在邏輯完全屈服於一套不能證

²⁷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UK: ECPR Press, 2008), p. 25.

²⁸ Ken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 319.

²⁹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0, No. 4(1986), pp. 99-142.

偽，邏輯封閉的創世神話³⁰。如同百年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解體之際全球政治版圖的重新劃分，冷戰後民族國家的數量越來越多，各色虛構的國界線重繪了世界政治的地理版圖。身份政治帶動的政治空間的界定，由此建構的話語以及全新的權力與知識邊界，這一方面代表了冷戰之後越來越複雜的敵我想象，另外一方面也根植在個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監控和審查行為當中——人們傾向於像一個技術官僚或者執業律師一樣把自己的生活分門別類（panopticism）³¹，認為只要窮盡事物的品類，便可以從根本上掌控全局³²。這種細分空間的日常政治，不僅激化了身份政治，創造了越來越多關於敵我的神話，而且創造了一種工具理性氾濫的拜物教思潮。人們開始越來越崇拜可歸類的，機械化的因果思維而無法接受歸類法則所不能涵蓋以及現有工具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相較於充滿主體性與獨立意志的人的政治與社會屬性，赤裸生命無疑是一個更能夠被工具與分類所把握的概念。

肆、新冠疫情的譜係

福柯指出，萬物皆有自身形成的譜係（genealogy）。「生命」自古希臘分化成 bios 和 zoe，一路變異成今日的「赤裸生命」，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本質上是一種譜係的形成。譜係在福柯的概念中是一種考察血統承襲的認知方式，相對於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史觀，福柯譜係學的意義在於既承認了人類事件在歷史軸線上的演化過程，同時也強調了事件史、歷史偶然性對

³⁰ Michael Williams,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2(1 June 1998), pp. 204-25.

³¹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London: Harvester, 1980), pp. 178-79.

³² 例如英國最新的新冠防疫政策，把全國所有地方行政區按風險高低劃分成三級。病毒並不會原地不動，這類政策從根本上不符合常識。然而對分類的迷戀勝過了對結果的考慮詳見"Prime Minister announces new local COVID Alert Levels",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rime-minister-announces-new-local-covid-alert-levels>.

形而上學史觀的消解。經由對尼采哲學的識讀，福柯強調了形而上學的「誕生」概念（*Ursprung*）與歷史中的「起源」（*herkunft*）的對立³³。理解事物演化背後的權力與知識結構，必須理解形而上學話語與複雜歷史事故之間的張力。福柯強調，我們一方面要回溯事物線性演化的方向，審查一如既往的人類意願和渴望。但這一線性宏大敘事只應該是歷史事件的參照係而非線索³⁴。

新冠疫情從一開始到底是什麼？我們見過了大量醫學領域的爭論。不少關於該病毒到底是嚴重呼吸道疾病還是大流感的爭論亦夾雜著各式各樣的對立的社會道德觀念。在此必須指出，新冠疫情從一月在武漢爆發至今，其本質上是一個中國問題。全球大部分國家，特別是西方對新冠病毒的認知困境以及政治包袱實際上是一種西方社會對中國式治理以及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焦慮與不適的表述。各式各樣的針對中國的疫情追責運動大體也都是為了緩解西方面對中國的不適。事實上冷戰之後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識讀方式脫離不了一種蘇聯式的想象——雖然西方知識界也有人不遺餘力地解釋為什麼中國沒有迎來蘇聯式的民主改革與政權垮臺³⁵，但絕少有人反思這個問題是不是根本上就問錯了。2015年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獲得諾貝爾文學家，她所描述的集權統治下的天災人禍以及國家機器的殘忍麻木再一次坐實了西方社會對蘇聯式政權把人命當做手段的想象³⁶。在西方世界的眼中，中國無疑是一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蘇聯政權，要論述這個政權的虛假繁榮，最便捷的話語便是說明這個政權治理的社會災難頻發，死傷無數；而這些災難大部分是人

³³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39.

³⁴ 英國學者喬治·勞森與約翰·霍佈森指出了歷史不同寫法的不同哲學含義，John M. Hobson and George Lawson, "What Is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 37, No. 2(1 December 2008), pp. 415-35.

³⁵ 例如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³⁶ 詳見 Svetlana Alexievich, *Voices from Chernobyl* (London: Dalkey Archive Press, 2005).

禍，如果不是這個政權，這些災難一個都不需要發生。武漢疫情爆發之後，西方朝野極其熱衷於將新冠疫情描述成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個中有三層意象：第一，中國政府和蘇聯一樣習慣性地掩蓋事實真相；第二，這個災難「敲響了政權的喪鐘」，第三，如果不是中國這種制度，這種災難完全可以避免。值得一提的是，當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Alex Azar)訪台時，美國國內疫情已經完全失控，而阿扎爾依舊告訴陳建仁以及到場聽眾：如果在美國，這個病毒一下就被消滅了(snuffed out)。這種無理反智的言論透露了冷戰之後西方極其日常的兩種思維方式：一是西方制度具有強大的工具理性，不僅道義上高人一等，實用性還很強，可以防災治病。二是非西方、特別是中國的制度，不僅道德上有問題，而且功能上有問題。在這一話語的演化進程中，西方人對中國社會的天災人禍投注了巨大的解釋熱情。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哪怕汶川地震已經達到了芮氏8級）以及當下的新冠疫情，統統可以被描述為人禍而非天災。唯有這種「死傷遍地」的他者意象，才能從道義上和實踐上坐實「中國不重要」的主觀想象³⁷。某種意義上說，如果必須要認為是中國這個制度「失德失能」才造就了西方今日的境地，那麼這個病毒必須起源於中國武漢，這是一個關於「誕生」(upsprung)而非「起源」(herfunkt)的問題——新冠病毒的所謂溯源工作一定必須進行，但溯源的結論現在就必須確定下來。

對中國的常年不適以及為緩解這種不適而開出了制度拜物教的處方奠定了西方早期描述新冠疫情的基本底色。武漢是一座人間地獄，新冠病毒如同非典一樣會讓人在街頭倒地暴斃；那些得了新冠肺炎無處收治的病人，那個追著靈車喊媽媽的小女孩；冤死的「吹哨人」李文亮，殯儀館門口絡繹不絕領骨灰的隊伍。《紐約時報》在報導武漢封城的時候每次都配上壓抑的巨幅照片：凝重瀰漫的霧氣和空空蕩蕩的長江二橋；還不止一次宣佈：看不出任何跡象能讓世界第二經濟體重新啟動。著名的左派公共知

³⁷ 關於中國增長不能持續且不重要的論述，見世紀之交學術界的定調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1999), pp. 24-36.

識分子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他早期的文章裡離奇地宣佈：隔離（quarantine）對控制這樣的疾病沒什麼作用。他還不乏偽善地「提點」西方人：如果不反思我們現代性的生活方式，武漢這般超現實的末世場景便會是西方的未來³⁸——對於一般的西方公眾而言，這當然不會是他們的未來，因為武漢是福柯地理學上遙遠的孤島，二月的武漢不可能照射得出未來倫敦、巴黎、馬德里的樣子，就好比加拉帕格斯群島的海龜不可能爬到肯星頓豪宅的窗前。

然而在西方世界開動了各種想象力和文學才華鞏固他們的中國想象的同時，中國社會開始建構起了自己的主體性敘事。西方試圖坐實制度拜物教的敘事之際，中國在一點點地坐實「赤裸生命」和「例外國家」的道德性論述。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內的媒體對阿甘本非常不屑³⁹，他們罕見地拾起了阿甘本這個在中國並不著名的哲學家，又立刻拋棄了「赤裸生命」的概念。中國的官方媒體把新冠疫情更多地描述成了一場「治理之爭」，他們採用的是美國社會科學九十年代關於「良治」（good governance）的話語，把辯論的戰場轉移到了西方社會「個人主義」的文化元命題上。三月份疫情在歐洲開始蔓延，中國國內充滿了關於西方國家放棄老人，搞群體免疫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說。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因此類言論被法國外交部召見，似乎可以看成一次罕見的、中國主動挑起的話語之爭⁴⁰。當三月底武漢疫情被控制住時，在廣大中國民眾的心中，西方主要的大城市充滿了冷漠和危險。政府放棄人民，年輕人不負責任明知感染還縱情狂歡。四月，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西方疫情之所以控制不住就是因

³⁸ Slavoj Žižek, "My Dream of Wuhan", *Die Welt*, 22 January, 2020, <https://www.welt.de/kultur/article205630967/Slavoj-Zizek-My-Dream-of-Wuhan.html>.

³⁹ 詳見〈一場關於權利、自由與治理的大論戰〉，《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20-05/19/c_139047770.htm。

⁴⁰ 這場外交風波詳見“France summons Chinese envoy after coronavirus ‘slur’”, *Support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15/france-summons-chinese-envoy-after-coronavirus-slur>。

為西方人沒有戴口罩的習慣。口罩這一疫情早期中國人異常堅持的防疫手段也隨即變成了社會責任和政府擔當的符號，中國的媒體開始異常執著地發掘西方人聚集而又不戴口罩的場景——類似於早期紐約時報的末世隱喻，這些不戴口罩聚眾狂歡的場景統統成為了中國民眾心目中西方集體自殺的想象。當美國總統候選人拜登習慣性地指責川普不戴口罩時，他實際上默認了來自中國的「生命政治」。

至此，新冠疫情起源於早期制度拜物教思維下民主保護「赤裸生命」的傳說，卻早已和生命沒有了關聯。這個疫情演變的譜係遵循了生命政治的一般邏輯，其上下半場的場面卻涇渭分明：中國和西方分別扮演了制度荼毒生命的指摘對象，而背後依賴的是同一種基於制度拜物教的生命政治。

伍、結論：探究全球失序的歷史社會學

本文藉由生命政治的概念，探詢了新冠疫情所塑造的基於「赤裸生命」的國家理由。對現有公共衛生與國際關係的分析，本文有兩個重大的理論干預：第一，從歷史長週期，特別是日常生活的演化來看，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失序是地緣背景下中國與西方身份政治積累的產物，是生活方式的競爭。第二，這種身份政治的邏輯內核實際上是一種工具理性與制度拜物教保護赤裸生命的神話，中國與西方論述的潛在邏輯完全一致。這種神話否認了現實世界的諸多偶然性和人類境況的不可測性，強行認為制度可以解決災難，不僅從根本上取消了國際合作與文明溝通的可能性，還會造成社會的整體認知失調——西方社會目前越來越複雜而荒謬的防疫政策便是這種認知失調的表現。

阿甘本與福柯的理論在核心概念上如出一轍，卻存在著方法論上的基本分野。阿甘本從赤裸生命的立足點出發，揭示了一切現代國家進入「受困狀態」變成例外國家的結構必然性；福柯則立足譜係學的歷史演化框架，強調偶然性的事件史對宏大敘事的消解，最終認定全球失序的本質是

話語與知識邊界的衝突。無論採取哪種路徑，生命政治的概念提供給我們的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新冠疫情背景下「國家行為」的識讀方式。生命政治的概念蘊含著一種歷史社會學的理論方向。在此我借用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坍塌」（degrounding）概念⁴¹。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伴隨著既有神話與敘事結構的坍塌時刻。即便接受了阿甘本的概念，現代國家的自由民主面向於「例外國家」的專制面向的切換也絕對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件。這個過程充滿著矛盾、痛苦和自我懷疑，地緣文化的競爭還會加劇這種困頓。西方社會面對自身曠日持久的疫情和那個最新的武漢大搞水上派對場面的複雜情緒，便會為他們帶來石破天驚的坍塌時刻。對於政治家和一般公眾而言，他們可以選擇繼續講述諸如「中國數據造假」抑或是「一切都來源於中國一開始的瞞報」這類故事來延緩坍塌時刻的到來；對於社會學者而言，描摹和串聯這一系列的坍塌時刻，正是研究當下全球失序時代的核心議題。

責任編輯：吳若菱

⁴¹ 詳見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8-10.

